

【思想文化】

试论晚清汉学与宋学之关系

陈国庆¹, 徐晓霞²

(1. 西北大学 社会科学系, 陕西 西安 710069; 2. 青岛海军工程学院, 山东 青岛 266000)

摘要: 汉学与宋学皆为传统儒学的重要派别。清朝前中期是汉学鼎盛的时代。但自嘉道中期以后, 传统汉学发生急剧变化, 乾嘉以来一枝独秀的学术格局被打破, 代之以宋学、汉学相与争鸣以及汉宋调和的局面。在乾嘉时期, 作为学术潜流的宋学浮出水面, 出现新的转机和发展趋势, 并由衰渐兴。居主流地位的学术思潮被另一种学术思潮所取代, 取决于诸多社会环境和学术因素的交互影响。其中既有学术文化的内在演进轨迹与自我流变线路, 也有社会客观环境变迁和学者们学术思维方式转变等外在影响。汉学在晚清的没落与宋学的复苏, 正是上述诸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 晚清; 汉学; 宋学; 汉宋调和

中图分类号: K2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48(2004)01-0001-04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holarships of Han and Song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CHEN Guo-qing¹, XU Xiao-xia²

(1.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2. Qingdao Navy Engineering College, Qingdao 266000, China)

Abstract: The scholarship of Han and Song were both important schools in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scholarship. Its prosperous period was the previous middle period of Qing dynasty. But since the middle of Jia and Dao times, a dramatic change occurred to traditional scholarship of Han, its dominant position was broken and the new situation was Song argued with Han. Finally Han and Song conciliated. The scholarship of Song rose in Qian and Jia times, and was given a new opportunity and tendency and transformation from decline to blossom. The dominant academic position being replaced was determined b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ocial circumstance and scholarship factors. It was the above factors that led to the decline of scholarship of Han and the blossom of Song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Key words: late Qing; scholarship of Han; scholarship of Song; conciliation between scholarships of Han and Song

一、汉学在晚清呈现衰势

清代初期, 历经明亡之痛的士大夫们, 开始对明亡所引发的文化困境进行反思。他们认为宋学是导致明代灭亡的精神因素。东林党人卷入朋党之争, 应对明朝政治腐败和社会动乱负责。循此, 18世纪

中期以后的学人开始远离政治的喧嚣, 并对宋学进行学术批评。他们认为宋学经过佛教思想的污染, 已演变为异端邪说, 背离先秦儒学的真谛。学人们越来越青睐于语言、天文、金石、地理等实证性研究, 希望通过训诂、小学、文学等手段, 挖掘、释读古代经典遗产的秘密, 以期恢复被宋学所玷污的先秦儒学

圣贤原义,这实际是回避对抽象义理的探讨。至 18 世纪后期,即清乾嘉时代,考据学日臻成熟并发展壮大,其自身内容也发生改变。早期汉学家提倡的通过汉学以回归经典原义的精神渐被忘却。考据学不再是单纯的辅助工具,它正成为学术研究的主流。江永(1681~1760)是实现这一转变的先驱。他声称:古音韵研究只是一项趣味盎然的学术课题,而不是实现理想化社会政治目标的途径^[1]。就一般情况而言,任何学派至全盛时必有流弊。换言之,其极盛之时就是走向衰落的起点。汉学也难脱此运。正如梁启超所言:“及其学既盛,举国希声附和,浮华之士也竟趋焉,固已渐为社会所厌。且兹学萃萃诸大端,为前人发挥略尽,后起者率因袭补苴,无复创作精神;即有发明,亦皆末节,汉人所谓‘碎义难逃’也。而其人犹自倨贵,俨成一种‘学阀’之观”^[2]。

当时,汉学日趋琐碎,门户之见盛行。汉学在嘉道之际的衰落,既有其外在原因也是汉学内在演进、自我流变的结果。在文字狱影响及汉学的桎梏下,“数十年来,承学之士,华者竞词章,质者研考据,风气既成,转相祖袭,天下之士,遂以食色为己任,廉耻为虚名,搜利禄为贤才,穷义理为迷惑,而官箴玷,风俗薄,生计绌,狱讼繁,面官籍籍,乘此而起。”汉学发展至此,已渐为学者所诟病,失去原有之生机。但汉学作为一个历史时期的学术主流,在整理古典遗产、保存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方面做出过极大贡献。它所提倡的实证方法,它所标榜的疑古精神,都为后世学者所继承,对中国学术界产生过深远影响。加之考古学、历史学之实事求是的精神,无不从清朝前期汉学中汲取学术思想之营养。

汉学没落还是当时社会危机加剧、学者们面对“变局”而试图以学术挽救危机的反应。晚清学者在面临强敌入侵和原有社会秩序即将崩溃瓦解之时,特有的思维定势使其反思路径往往取向于对当时主流思潮的检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学术思潮。汉学的衰落即是学者们对明亡所引发的社会与文化困境进行反思的明证。学术文化主潮生命力的长久,既取决于学术文化本身的成熟与完善,也从根本上受社会生活需求的制约。一旦社会生活本身发生根本性变革,它的学术文化主潮的内容及其走向都将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日益加深的社会危机,激起士人政治道德意识的复兴。嘉庆执政以后,一改乃父遗风,下令有上奏资格的官员上书,议论朝廷面临的问题,清王朝曾经十分严厉的思想控制状况,至此出现了松动迹象。开放言路为学者们发表见解打

开了方便之门,一度消弭的东林党人式的政治与道德热情重新回到士人中间。

二、宋学的短暂复兴

嘉道以后,由于社会环境变化以及学术流变与更新,理学由衰渐兴,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并为挽救危机四伏的封建王朝,提供了精神动力与学术支持。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居官方意识形态垄断地位的宋学,在走向其终点之前,出现了暂时的回光返照、由衰而兴的局面。宋学在清代虽已不是学术主流,但从事宋学研究者亦代有传人。桐城派对汉学家的攻击曾以“正学”的态度作过激烈反抗。姚鼐(1732~1815)因求师于戴震遭拒而怀恨心头,在戴震去世后对其进行猛烈抨击,所撰《惜抱轩尺牋》多收痛诋戴震和考据学的文字。桐城派以及常州阳湖派号称“文以载道”理想的代表,是宋学的坚实盟军。他们批评汉学家倡导的骈体文以及八股文违背儒学理想,认为可直接抒政治观点的古文是儒家价值观念最妥当的表达方式,是最适宜抒发自己政治见解的文学载体。文学领域的争论也陷入汉宋之争的范畴。考据学之对于宋学的冲击,不仅在于宋学地位的沦落,而且在于心性之学为人忽视,道德修养由中心退居次要地位,成为考据学之陪衬。更重要的是宋学的权威性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考据学批评怀疑的问学方式为批评怀疑传统儒学提供了生存空间,考据研究使他们得出宋明理学违背儒家经典原义的结论。戴震是此类学人的代表,他主张字字训诂以明义理。章学诚对此有过明确评论:“凡戴君所学,深通训诂,究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3]戴震以考据字义的方式对程朱学说发起批评。在《孟子字义疏证》中,他指出程朱言“理”乃取自释老两家,因而不合六经、孔孟的原意。他通过考据经传古训,建立起自己的义理系统,赋予“理”字以新的涵义,意图以他自得之义理来取代程朱理学在儒学中的正统地位。18 世纪的部分学者已经意识到,复古思潮背后的经典本位意识对宋学的正统地位已经构成威胁,甚至还会引发废黜正统儒学的危险。姚姬传、程鱼门、翁覃溪都曾对戴震进行反驳,对宋学予以辩护,但在当时学界并未引起大的反响,这表明程朱势力此时尚难抵挡汉学锋芒。

宋学在清代后期的复苏当以著名学者方东树《汉学商兑》的发表为标志。方东树(1772~1851)为姚鼐四大门徒之一,曾学古文于姚鼐,后又改宗朱熹,讲义理之学。《汉学商兑》是其系统反驳汉学的

著作。1818年,即嘉庆二十三年,江藩刻成《国朝汉学师承记》,以区别汉宋门户。在此书中,江藩认为经术“一坏于东西晋之清谈,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元明以来,此道亦晦。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江藩此书的刊行,激怒了宋学的追随者方东树。1826年方东树著《汉学商兑》予以反击。举凡被方东树认为与汉学有关的人物均遭攻击。其中尤以戴震为烈。《汉学商兑》是向汉学霸权地位挑战的宣言书。此书出版后,得到程朱势力的支持与赞赏,在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在同治、光绪年间此书一再重印,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道光以后宋学在思想学术界的地位。对于《汉学商兑》出版以后汉学与宋学的此消彼长,时人有过评论:方东树“颇究心经注,以淹洽称,而好与汉学为难,《汉学商兑》一书,多所弹驳,言伪而辩,一时汉学之焰,几为之熄。”^[4]道光以后,中国思想学术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汉学在嘉道时期的瓦解表明学术思想的发展又到转折关头。《汉学商兑》的出版无疑是宋学振兴的强心剂。因此道光以后,在清代高居庙堂的宋学重又回到士大夫中间,这是道光以后学术发展的新趋向之一。此时清王朝危机四伏、风雨飘摇的局势也为宋学的复苏提供了现实需求。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上半叶,社会危机的种种迹象表明盛世已过,衰世将至。一批士大夫力图振作,急需精神依托。在他们的思维中,德治依然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坚守封建伦理的程朱理学依然是正人心、易风俗的有效途径。嘉庆帝对1813年天理教进攻皇宫后的反思结论是:“修己以治百姓,我君臣备思奋勉,或可挽回污俗,稍盖前愆于万一耳。”^[7]所以,道光以后宋学复苏局面的形成也有其政治背景。

曾国藩(1811~1872)是推进宋学复兴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并非出身“诗礼世家”,而是湖南湘乡一个半耕半读的子弟。曾国藩致力于宋学的探研是在他中进士授翰林以后。当时他和唐鉴、倭仁、吴廷栋等理学家相与讲学,他曾虔诚地向唐鉴求教“检身之要,读书之法”。这一时期,曾国藩同唐鉴等人的交流对他的学术生命有再造之功,奠定了他以后的学术根基。此后,曾国藩终其一生,无论是修身实践还是经邦治国,均按照理学家“修齐治平”的理论来修身处世。他不仅严格遵守唐鉴的读书之法,而且学习倭仁每天写修身日记的做法,不断对自己进行道德自律。这种恒心与毅力一直坚持到他死前一日。曾国藩死于二月初四,《日记》则止于二月初三。《日

记》中曾国藩不断对自己提出严格要求,并对不合圣道的行为进行自责与反省:“平生只为不静,断送了几十年的光阴。立志自新以来,又已月余,尚浮躁如此耶?”^[4]在《曾文正公日记》和《曾文正公家书》中,这种修身功夫随处可见。反映了宋学对其人生态度的深刻而持久地影响。

咸同时期宋学复兴达到高潮。一批宋学人士活跃于政治舞台。他们以强化封建王朝的政治统治和维护封建纲常名教为己任。19世纪50年代以后,纵横南北十六省的太平天国起义不仅打击了封建王权,其删除“四书五经”的行为也使居官方意识形态高位的儒学遭到打击,引起读书士子的恐慌。曾国藩攻击太平天国:“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5]曾国藩号召人们起而卫道,希冀以此挽救清王朝的统治。这也是宋学在这一时期达到高潮的重要原因。在宋学体认精神的推动下,曾国藩、罗泽南、李续宾等湖湘文人学者组织湘军,并取得战争的胜利。清王朝能够剿灭太平天国,除得力于后期的“借师助剿”之外,同封建士人的卫道决心以及宋学对社会政治的干预密不可分。太平天国起义后,清朝统治者更加意识到程朱理学的“治术”作用而大力加以提倡,宋学名士也得以重用,出现了一批以曾国藩、倭仁、李棠阶、吴廷栋为首的宋学名臣。宋学再次达到自己的政治颠峰。但是,整个封建王朝江河日下、气息奄奄的历史趋势毕竟不是宋学所能扭转的。伴随着清王朝的衰落,宋学在晚清的再次复兴也如昙花一现。随着1905年科举制废除以及教育改革进程的加快,程朱理学逐渐淡出学者们的知识视界。宋学在道咸年间的复兴,并不能简单视为宋学的复旧。清初学界对心学的批判以及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都使宋学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相应的自我调整,尽量避免流入空疏的弊病。晚清宋学的复兴与经世致用之学的崛起相得益彰,二者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启迪了晚清宋学中的务实与经世的思想因素。曾国藩更提出“义理经济合一”的理论,在义理、考据、辞章之外别加“经济”一门,突出了宋学的经世功能,一变宋明理学只讲心性的空疏学风,为宋学在晚清的复兴注入新的活力。

三、汉宋折衷调和

19世纪初叶,汉学的发展受到挑战,传统儒学有回归宋学的倾向。宋明理学在晚清的复兴,并不意味着对汉学的全然否定。许多理学家,其治学仍

深受汉学考证方法的影响。长久以来汉宋两家激烈地门户之争在晚清被淡化。明末清初对心学的批评以及汉学在嘉道以降所受到的抨击使学者们深深意识到,汉学与宋学各有弊端,也各有优长,是治经的两条途径,都有其不可废弃的价值。学者们将汉学与宋学“譬之登山,或自南或自北,其路之平易远近不能皆同,要皆望是山以行,不迷于所往,则固殊途同归也”。会通汉宋学术,强调二者兼采,这样的态度成为传统经学在晚清发展的重要思路。

清朝初期,汉学刚刚萌芽,许多大儒为学主张汉宋皆采,并无门户之争。随着清朝统治者文化分裂政策的推行,以及汉学日益壮大强盛,汉宋之争亦愈演愈烈,至江藩、方东树二者的门户之争达到顶峰时期,学术界不同派别之间的相互攻讦已经司空见惯。江藩与方东树的论战,都旨在攻击对方学术,相互攻讦的结果是使汉学与宋学的缺点暴露无疑,也为日后汉宋兼采埋下伏笔。在《国史·儒林传》中黄宗羲指出:“两汉名教,得儒经之功;宋明讲学,得师道之益;皆于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讥而互消也。”阮元的学术倾向是抑宋而扬汉的。但在他去世前十年,已逐渐重视义理之学,意识到汉宋两家学问各有优长。这是汉学在 19 世纪初向汉宋折衷转化的标志之一。嘉道年间许多学者放弃固守门户的立场,提倡汉宋调和,如邵懿辰的《礼经通论》,夏忻的《檀弓辨证》和《述朱质疑》等是当时倡导汉宋兼采的代表性著作。在这种学术导向下,门户之争在道咸年间遂被汉宋调和的论调所取代。徐世昌《清儒学案》对道咸间的学术取向曾有过专门评价:“道咸以来,儒者多知义理、考据二者不可偏废,于是兼宗汉学者不乏其人。”

曾国藩是晚清倡导汉宋兼采的代表。终其一生,曾国藩对宋学情有独钟,其言行无不以宋学为指归,但又不废汉学。中年以后,他曾与精通考据之学的刘传莹互助互勉,一改早年对考据学的排斥态度,认为考据学是治学的必由之路。他在咸丰九年四月二十一日《谕纪泽》的信中曾嘱咐:“尔有志读书,不

必别标汉学之名目,而不可不一窥数君子之门径。”陈澧(1810—1882)的《东塾读书记》更是对汉宋兼采这一问题的总结性著作。他在总结自己的为学宗旨时指出:“合数百年来学术之弊而细思之,若讲宋学而不讲汉学,则有如前明之空陋矣。若讲汉学而不讲宋学,则有如乾嘉以来之肤浅矣。况汉宋各有独到之处,欲偏废之而势有不能者。故余说郑学则发明汉学之善,说朱学则发明宋学之善,道并行而不相悖也。”^[6]陈澧对汉学之弊多有陈述,但能实事求是,无门户之私。

晚清学者主张汉宋调和兼采,其实在他们心目中,二者并非平分秋色。在宋学复兴的年代里,无论是曾国藩还是陈澧,都一宗宋儒,以探求义理为治经的唯一标准,汉学不过是达到“义理”这一目的的途径。曾国藩认为精研文字,有利于重申先王之道,陈澧也认为宋学本末兼赅,但他始终把义理之学放在高于考据之学的层次上。认为“士大夫之学,更要于博士之学。大夫无学,则博士之学亦难自立矣。”^[6]后人将他的会通汉宋称为“以明朱子之学,而除门户之见”。晚清学者的汉宋兼采,并未能脱出宋明以来儒学只注重阐发道德理想的旧模式。却为宋学在晚清的发展增添了新色彩,即黜浮崇实,消除门户之见,重视经世致用。

参考文献:

- [1] 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 [2]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3] 章学诚.文史通义[M].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
- [4]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日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7.
- [5]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诗文[M].长沙:岳麓书社,1986,232.
- [6]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6,648.

[责任编辑 杨彬智]